

回归无核世界：理想与现实

张小明

冷战结束以后,核武器的未来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政治家、学者们纷纷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世界上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会(包括因特网论坛)很多,也有不少的著述问世。在讨论核武器未来这个话题的时候,“回归无核世界”的主张总是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也有的人声称那只是难以成真的梦想。1998年5月发生的南亚核危机是冷战后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它无疑给主张“回归无核世界”的人以极大的冲击,但没有也不可能导致关于“回归无核世界”的争论之完结。在发生南亚核危机这一国际背景之下,探讨“回归无核世界”的理想与现实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回归无核世界”的理想不是最近才有的,它伴随着世界进入核时代而产生,是人们追求持久和平的“大同世界”的良好愿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宣告世界进入了核时代。在东西方冷战主导国际政治的时期,世界核武库不断膨胀,核武器的数量迅速增加,其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到冷战结束前夕的90年代初,世界已拥有5万枚以上的核弹头,爆炸力相当于130—160亿吨炸药,等于二战中所用炸药的5000倍,其破坏力为美国投掷在广岛原子弹的100万倍。在世界核武库中,美国和苏联两家公司生产与储存的核武器,包括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占世界的96%以上。^[1]

就在世界进入核时代、核武库迅速膨胀的

同时,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核武器的军事和政治效用遭到不少人的怀疑,彻底销毁核武器、“回归无核世界”的理念应运而生。

我们通常所说的核武器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军事手段,因为其威力之大,是任何常规武器所无法相比的。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相当于1.5—2万吨的TNT炸药。而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相当于1.25万吨和2.2万吨的TNT炸药,导致20余万人当场丧生(其中广岛14万人,长崎7万人),随后又有很多人因为核辐射的缘故而死去。这两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到德国城市中的所有炸弹之总和。^[2]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得多,一颗氢弹可以相当于几十万吨的常规炸药,或者数十枚原子弹。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导弹等核运载工具可以把核弹头送到数千里外的目标。携带核弹头的多弹头导弹、潜射导弹、机动导弹、巡航导弹等等,不仅可以很精确地击中目标,而且防不胜防。核爆炸及其产生的核辐射,会导致大量居民的死亡,仅仅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核弹头的一部分,就足以灭绝地球上的人类。不仅如此,大规模核爆炸所掀起的尘埃和火灾的烟雾,会使整个地球处于黑暗和严寒的笼罩之中,形成恐怖的“核冬天”。^[3]总之,核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它是一种毁灭性的武器,会导致难以计算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甚至人类文明的毁灭。

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它促使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核武器难以成为有效的军事和政治工具,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会更安全、更稳定。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便是较早开始主张销毁核武器、回归无核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战后初期曾经竭力主张美国发展核武器和保持核垄断的美国“遏制之父”乔治·凯南,也在1957年的“里思讲座”中明确提出,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它是一种“无效和没有希望的武器”,因此不能为“建设性的、充满希望的对外政策目标”服务。他主张全面销毁核武器,并且呼吁美苏就此达成协议。^[4]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在1959年提出销毁一切核武器的建议。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两国走到了核对抗的边缘。这场危机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并且在限制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上进行了某些合作,以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1963年美、苏、英三个核国家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包括美苏在内的115个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该条约把完全销毁核武器作为终极目标。然而,在冷战时期,大国都把维持一个庞大的核武库和核威慑力量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回归无核世界”基本上只是反核和平组织的口号,虽然有的政治家出于宣传的目的,也极力鼓吹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实际上,东西方之间的核军备控制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微乎其微的,在80年代后半期冷战逐步走向消亡之前没有达成过核裁军的协议。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回归无核世界”的理念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境。

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东西方关系的极大缓和以及冷战开始逐步走向终结,有关核大国达成了一系列核裁军协议。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贬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倾向,“回归无核世界”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似乎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1987年12月8日,美苏签订了一个历史性的核裁军协定,双方同意销毁两国的中程和中短程核导弹,其在两国核武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4%。1991年7月31日,美苏两国签订

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START-I,规定双方各自削减大约三分之一的战略核武器,限定了各方战略核力量的数量及弹道导弹的总能力,并就核查方式、条约期限等方面作了规定。^[5]除了核裁军,在苏联解体之前,美苏还就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达成了一些协议,如1987年9月15日签署的《美国苏联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6]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和冷战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更给世界范围的核军备裁减以极大的推动。前苏联的继承者俄国同美国继续就进一步大幅度裁减核武器进行谈判,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继1991年7月的START-I之后,1992年6月美俄又达成了《削减战略武器的谅解协议》,即START-II。这项协议使得美俄双方实际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各自削减了约三分之二,把双方极具威胁性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全部解除了部署,并且对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数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它表明冷战后的核裁军迈出了一大步,对降低核战争危险和促进世界范围的核军备控制,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1997年3月,美俄两国总统在赫尔辛基举行最高级会晤,双方就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II)的指导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在2007年以前,把两国储存的战略核弹头各减少到2000到2500个。

不仅如此,冷战后有关大国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为建立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机制而进行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它包括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NPT)无限期延长,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冷战后,中国和法国都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1995年无限期延长的该条约重申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

与上述“合作性的非核化”进程^[7]相同步的是,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回归无核世界”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且提出或赞同这种思想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反核组织或者是少数个别人,而且还有很多大国的政治家、军方高级领导人和战略思想家。

世界上主要核大国的领导人从80年后期

起,一再宣称核战争没有胜利者。例如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原则在核时代已经完全不适用,在核时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8]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美苏两国最高级会晤后的联合声明中,也向全世界宣布:“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绝不能进行核战争。”^[9]从80年代后期起,学者们开始了一个关于核武器功效的大辩论,有的人对传统的关于核武器导致冷战没有发展成热战、“持久和平”得以维护的观点进行挑战。^[10]冷战结束以后,不少原先竭力主张核威慑的战略家也认为核武器的作用在减小,核扩散对世界的威胁很大。^[11]一些组织和个人明确提出全面销毁核武器、回归无核世界的主张,它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94年,美国亨利·史汀生中心开始研究如何全面销毁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1995年12月该中心的第二份报告《演变中的美国核战略》提出了回归无核世界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政治条件。1997年3月,这个中心发表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全面销毁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报告,提出美国要为实现“回归无核世界”的目标而努力。^[12]1996年堪培拉委员会(Canberra Commission)发表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出“全面销毁核武器。”^[13]同年12月,来自17个国家的60位退休将军,包括3位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前美国战略部队司令(US Strategic Command),也提出同样的主张。^[14]

总之,“回归无核世界”是人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观念,并且认为它是可以成为现实的理想。

(二)

理想变为现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冷战结束后几年的情况来看,“回归无核世界”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因为在近期内,核武器还被视为是可以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冷战后

的现实同人们的理想是有矛盾的。

冷战后的核军备控制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离人们预期的目标还很远。美俄在冷战后签署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议,表明冷战后的核裁军迈出了一大步,对降低核战争危险和促进世界范围的核军备裁减,无疑起了极大推动的作用。然而,人们对此只能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这是因为到2003年美俄双方能否如期真正完成裁减,目前还不能确定。俄罗斯国家杜马迄今尚未批准这个协定,俄罗斯国家杜马中反对批准该协定的人不少,有的人认为这项协定出卖了俄罗斯的安全。^[15]由于北约东扩等问题引起的美俄关系降温也会阻碍协议的批准和顺利执行。即使到时实现了裁减,美俄双方仍可保留3000—3500枚核弹头,它还将占全世界核弹头总数的绝大部分,照旧可以给世界以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该协议只涉及实际部署的核弹头,不涉及两国大量库存的核弹头,也没要求一定销毁裁减下来的核弹头。^[16]1997年3月,美俄两国总统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在2007年以前把两国储存的战略核弹头各减少到2000到2500个的协议仅仅是个意向性的东西,只有当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START—后,美俄才可能就START—达成正式的协定。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其他核大国还没有加入核裁减的行列。因此,今天的世界离全面核裁军的目标还很远,冷战时期所具有的核威胁虽然已经大大下降,但是远没有最终消失。

美俄两大核国家在谈判裁减核武器的同时,也继续奉行核威慑的政策,并且为改进核武器而进行努力。这显然不利于世界范围核裁军的顺利进行。

1997年7月和9月,美国进行了两次次临界核试验,美方称它不违反全面禁试条约。此外,美国计划在1998年财政年度再进行4次试验。所谓“次临界核试验”使用的原料同样是钚,只是试验在到达产生核裂变连锁反应的临界状态以前便结束。即使这种试验不违反有关国际条约,但它无疑违背了国际社会希望彻底

销毁核武器的愿望,次临界核试验数据很可能被用于开发高性能核武器。这表明美国正在努力提高核武器的性能。1997年8月,据一些得到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内部情报的美国反核团体有关人士透露,美国已在其国内的空军基地部署了核炸弹,这种炸弹是对迄今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核炸弹进行改良而制造的新型直接攻击地下设施的B61-11核炸弹。这是苏联解体后美国首次部署新的核炸弹,美国的设想是以此来破坏伊拉克的地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强调,它是改良了现有的核炸弹,而反核团体则认为它是新型核炸弹,违背了禁止开发新型核武器的全面禁试条约。与此同时,另外一核大国俄罗斯也没有放弃核威慑力量的意向,而且美国还怀疑俄罗斯于1997年8月在北极新地岛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可以肯定的是,美俄两个主要核大国都努力保持自己的核力量,并且使之现代化。

除此之外,冷战后的核扩散问题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由于苏联的解体,原苏联一个核大国分解成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4个有核国家,它们都拥有战略和战术核武器。1992年5月,美国与独联体领导人曾签署关于前苏联国家内核武器的条约,规定由俄罗斯全权控制前苏联境内的核武器,各有核国家境内的核武器均应交由俄罗斯负责销毁。然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于销毁其境内包括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核武器的承诺,遇到了不少阻力。比如乌克兰议会中就有很多人表示,在获得有效的安全保证和足够的其他方面补偿之前不应放弃核武器。除此之外,冷战后的核扩散问题还表现在:前苏联核材料、核人才流出境外;许多非核国家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增强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因而努力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美国国防部1991年国防报告估计,到2000年,将有8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核能力,等等。^[17]核扩散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防止核扩散的机制(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是目

前还不能说核扩散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最近几年内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冲击国际防止核扩散机制的事件。其中,朝鲜半岛核危机和南亚核竞赛最引人注目。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在1992—1994年间,其结果是,朝鲜半岛局势一度极为紧张。^[18]1994年10月朝美两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打破了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僵持局面,从而大大缓解了半岛紧张局势。^[19]但是1998年12月美国又声称发现朝鲜的核设施,要求对方同意国际检查,朝鲜半岛的核问题重新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1998年5月发生在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更是冷战后出现的对国际防止核扩散机制构成严重挑战的一个重要事件。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连续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武器国家。紧接着,印度的邻国和宿敌巴基斯坦于5月28日宣布“成功地”进行了5次核试验。5月30日,巴基斯坦又宣布当天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时之间,南亚出现了一场举世关注的核危机。

由于印巴已跨过了“核门槛”,致使该地区的核扩散成为现实,因此南亚核危机无疑是冷战以后最严重的一个核扩散事件,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违背了冷战后国际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潮流,给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以极大的挑战,对“回归无核世界”理想的支持者更是当头一棒。首先,南亚事态是对国际社会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努力的一大打击。1996年9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供所有国家签署。该条约规定所有44个已知拥有核反应堆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必须签字才能生效,这些国家包括5个公认的核国家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具有核能力的“核门槛国家”。5个核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字,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所以这项条约迄今没能生效。这次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使得这项条约的生效期更不确定。其次,印巴进行核试验可能给其他“核门槛

国家”以鼓励,采取类似的行动,给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增加更大的困难。比如中东的伊拉克和伊朗就是重要的“核门槛国家”,^[20]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行为可能导致它们迈过核门槛。最后,南亚的核竞赛也给国际社会和有关大国防止核扩散的意志以极大的考验。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作出了反应。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两国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印巴两国主要邻国的中国自然对南亚的事态十分关注,它同美国等大国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南亚核危机成为1998年6—7月间克林顿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首脑就此发表了联合声明。^[21]但是,这些措施是否能够阻止南亚地区核竞赛、使印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人们将拭目以待。如果这种努力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意志将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南亚核危机给国际社会努力创建的防扩散机制以有力的冲击,这无疑会动摇人们对“回归无核世界”的信念。从这一点上说,南亚核危机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也就是说,冷战后的现实并不是让人对“回归无核世界”特别感到乐观。

(三)

如上所述,冷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个贬低核武器作用的潮流,“回归无核世界”成为很多人的信念与理想,然而国际现实却很严酷,“回归无核世界”的目标还遥遥无期。最近发生的南亚核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笔者认为,实现全面裁减与销毁核武器、回归无核世界的目标,至少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其一,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家们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不再把核武器当作可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其二,国际社会建立起有效的禁止试验、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的机制。从目前来看,这两个前提条件都不存在,在可见的将来也难以确立。

冷战的结束虽然大大减少了核大战的危

险,也促成了有关大国就大规模裁减核武器进行谈判,并且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家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保持一个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依然是核国家奉行的一个重要战略原则。虽然今天没人怀疑核武器的毁灭性和运用核威慑战略的危险性,但是主张继续保持足够核威慑力量的还大有人在,核威慑观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难以改变。

大致说来,学术界里认为核武器政治、军事效用很少的人相对较多,但是也大不乏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在后一类人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肯尼思·沃尔兹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至今坚信,核武器可以维持和平。正如1996年沃尔兹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学期间接受学术专访时所说的:“核武器是世界上最具有防御优势的武器。它可以赋予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以巨大的保护力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盟国无疑将受到它的保护,如美国、日本、俄国等。而且,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得战争的爆发变得极其困难。无论意识形态多么不同的国家,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核武器能维持和平,因为核武器破坏力是如此之大,妄图发动核战争无疑是自杀之举。”^[22]

实际上,目前世界主要核大国仍然把维持核威慑力量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策目标。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1994年9月在史汀生中心的一个讲话表明,今天美国的战争计划与60年代一样,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23]1997年10月,美国现任国防部长科恩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要保持一个强大的核威慑力量,而且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对付诸如“捣蛋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等等威胁。”^[24]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克林顿总统1997年11月底发布指令,对美国核战略进行16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调整,全面修正了1981年里根政府确立的核打击目标、核力量使用方针等。该报告反映出美国的核战略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承认今天“核武器的作用比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小”,因而将进一步削减

核武器数量,以节省军费开支,享受“和平红利”,另一方面又坚持把核武器当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依赖核武器的“威慑”和“遏制”作用,坚持保留战略核力量。^[25]为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核力量,美国虽然承诺不进行大气层和地下核试验,但是它依然在试验室进行“次临界”核试验。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谈到核武器未来的时候一再表示,在可见的将来“回归无核世界”目标难以实现。正如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1997年2月12日在参议院作证时所说的,彻底消灭核武器只是一个终极目标,但是目前还不是销毁美国所有核武器的时候,以核威慑遏制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6]还有其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公开反驳关于销毁所有核武器的观点。^[27]就是极力鼓吹美国应在核裁军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的人士也承认“回归无核世界”目标难以在近期得到实现,美国目前仍然要保持有效的核力量。^[28]

另外一个核大国俄罗斯也如此。俄罗斯的经济软弱和政治不稳定似乎导致了许多政治家和分析师把核武器看作是俄罗斯维持大国地位的唯一因素。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在1997年2月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俄罗斯一定要保持核遏制能力,要保证俄战略核力量的战斗力。据1997年10月17日《华盛顿邮报》透露,俄罗斯的军事理论正在发生变化,即用核力量弥补常规军力的不足。俄罗斯国家杜马迄今没有批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一些议员反对过分削减俄核力量,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8年7月3日在俄安全会议例行会议上说,“核力量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他强调指出,必须极其现实地研究核领域的局势。俄罗斯目前的战略核力量完全能够可靠地确保国家安全。据五角大楼披露,冷战后俄国仍然在继续建造一旦俄国遭核袭击时维护国家领导人安全的掩体。美国也有类似的设施。

英国、法国等其他核大国在冷战以后也明确表示要维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它们还没有加入核裁军的行列。^[29]等到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SSTART—)成为现实后,其他核国家才会考虑加入核裁军谈判,可能达成第四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SSTART—)条约。

在核大国坚持保持一定核威慑力量的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冷战结束以后没有放弃研制核武器的努力,把拥有核武器当作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条件。印度声称自己已经成为了核国家,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另外一些拥有核能力的“核门槛”国家也随时都可能成为核国家。这也表明,政治家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核武器依然被视为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工具。据印度报纸《亚洲时代》1998年7月19日报道,印度外交部人士告诉该报记者:“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获准被承认为核武器国家,并获得安理会的席位。如果我们的这些要求得到满足,我们愿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乃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关于建立和完善核控制机制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无限期延长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供所有国家签署。但是离建立有效的禁止试验、生产、扩散和拥有核武器的国际机制的目标还很远。已有的防止核扩散机制的有效性也令人怀疑。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未能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去年5月进行核试验。

冷战的结束导致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突出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安全观念正处于变化之中。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经济安全等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在这种国际转轨过程中,人们有理由认为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日益下降。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的性质,即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是一个“自助的系统”,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手段依然是国

家维护自身安全、追求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要让世界上的政治家都放弃“核威慑”的观念,达成全面裁减和销毁核武器、回归无核世界的共识,这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回归无核世界”是人们长期追求的目标,尽管今天并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但是人们没有也不应放弃这个美好的理想。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总会比有核武器的世界更安全一些,“回归无核世界”应该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在可见的将来,核大国完全可能就保持低水平的核威慑力量达成协议,世界防止核扩散机制也会日臻完善。只要政治家们不懈努力,“回归无核世界”并非完全是不能成为现实的理想。

注释:

- [1] 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 [2] William Gay and Michael Pearson, *The Nuclear Arms Race: A Digest with Bibliographie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7), pp. 22-23; 念渝:《原子弹是这样扔下去的》,《国际展望》1995年第17期,第20—22页。
- [3] 同注[1],第580页。
- [4] (美)凯南:《俄国、原子与西方》(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56页。
- [5] 《北京晚报》1997年12月5日,第16版。
- [6] Ramond L.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p. 522-541.
- [7] John Baylis, “The Future of Nuclear Weapons: Balancing Power and Mora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XIII, no. 5, August 1997, pp. 1-14.
- [8] (前苏联)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 [9] Sean M. Lynn-Jones, Steven E. Miler and Stephen Van Evera, eds., *Nuclear Diplomacy and Crisis Manag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0, p. 31.
- [10] John Mueller,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88.

- [11] R. O'Neil, “Britain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4, October 1995. 原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R. O'Neil 先生 1998 年 7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老师的座谈中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核武器在冷战时期起了一个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用核武器来对付他人的想法是荒谬的,如果没有核武器,世界会更好。
- [12] *An American Legacy: Building a Nuclear-Weapon-Free World*, Final Report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Project on Eliminat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March 1997, Henry Stimson Center.
- [13] *Report of the Canberra Commiss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Canberra: National Capital Printers, 1996).
- [14] 同注[7]。
- [15] Online Nuclear Futures Forum, April 14, 1997, Henry Stimson Center.
- [16] 初源盛:《浅论美俄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的意义和局限性》,《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1期;夏立平:《冷战结束后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的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5期。
- [17] 吴鹏:《冷战结束后的核控制走向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3期;Graham T. Allison, Owen R. Cote, Jr., Richard A. Falkenrath, Steven E. Miller, *Avoiding Nuclear Anarchy: Containing the Threat of Loose Russian Nuclear Weapons and Fissile Materia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6).
- [18] 曹丽琴:《核检查问题与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8期。
- [19] 薛君度、陆忠伟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周边环境》,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24页。
- [20] Shahram Chubin, “Eliminat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Persian Gulf Case,” *Occasional Paper No. 33*, March 1997,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 [21] 《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第2版。
- [22] 谢鹏:《肯尼思·沃尔兹教授访谈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编:《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
- [23]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7 页。

[24] *Washington Post*, Oct. 31, 1997, p. A25.

[25] 萨本望:《漏洞百出的核战略》,《人民日报》1997 年 12 月 16 日,第 6 版。

[26]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Water B. Slocomb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before the Senate Government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liferation and Federal Services Hearing on Nuclear Weapons and Deterrence,” February 12, 1997. <http://www.stimson.org/pub/stimson/>

[27] 如“Statement of Richard Perle before the Senate Government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liferation and Federal Services Hearing on Nuclear Weapons and

Deterrence,” February 12, 1997. <http://www.stimson.org/pub/stimson/>

[28] “Statement of General Andrew J. Goodpaster to the Senate Government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liferation and Federal Services Hearing on Nuclear Weapons and Deterrence,” February 12, 1997. <http://www.stimson.org/pub/stimson/>

[29] Rebecca Johnson, “British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Nuclear Weapons,” *Occasional Paper No. 37*, January 1998,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Camille Grand, “A French Nuclear Excep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38*, January 1998,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作者: 张小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